

我的借書經驗

陳芳明

一個平凡的讀書人，在三十歲之前，是不可能讀多少書的，即使真的讀了許多書，也不可能完整地領

會全部書籍的真意，學問的探索有賴長期累積的功夫，同時也要依賴思考的成熟，在壯年以前，恐怕還停留在尋找興趣、維持興趣的階段吧。大約從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的這段年齡，是求知慾最强烈的時期；但讀起書來也最容易盲目慌亂，「飢不擇食」也許是這個時期很恰當的寫照。然而，毛病也往往出在這裏，可能一天換一本書，持久一點也是一個星期換一本，幾乎都在封面與封底徘徊，最多讀一讀前言和後記，至於書中說了些什麼，很少仔細再看一眼。也許別人

讀書不盡如此，不過，這十年來，我確實有點像上面所說的，讀書如走馬看花，盡成過眼煙雲。

我的年齡還不到三十，但接近壯年也是不久一、二年的事了。被時間驅趕到人生的另一個分水嶺，心底不覺淒愴，瞻前顧後，得失之心更加强烈。在我行將告別「青少年時期」之際，寫下這篇文章，似乎有點像是寫懺悔錄，心情複雜極了。我不敢說自己有什麼讀書經驗，但至少借書的經驗還是有的。在二十餘年的讀書生涯中，雖然對於買書不遺餘力，不過有許多重要的書籍，包括昂貴的、絕版的、被禁的，無不借自師友及海內外各大圖書館，如果沒有師友的幫助

，恐怕我讀書不會那麼順利。當我最需要某本書的時候，那本書竟然適時地出現，不僅讓我驚喜、珍惜，而且也最使我難忘；同樣的，日夜夢寐的書籍，百求而不可得，便令我耿耿於懷，嘆息不已。現在回想起來，在連縣不斷的讀書過程中，自己不都是往返於喜悅和悵惘之間嗎？

在這篇文章裏，我只想寫出臺灣一部份書籍的流通情形，並且比較一下海外的中文藏書；同時也記錄我這一代——戰後的一代——是在怎樣的情形下看書的。我遇到的書，可能是非常平凡的，我的讀書環境，也或許是平淡的；不過，我相信，我的際遇可以反映出這個時代的一些現象。因為，我相信，有不少和我一起長大的青年，分享了同樣的喜悅，分嚐了類似的惆悵。

一、從左營那個小鎮說起

左營，是我的家鄉，在行政上隸屬高雄市，但在我的感覺上，它却是獨立的。從小學到高中時代，都是在那個小鎮度過的。記憶中的左營，和臺灣其他的鄉鎮一樣，平靜、樸素、略帶西化。我讀的是舊城國

民學校，規模不大，校舍蒼老，但因座落於春秋閣的潭邊，環境還相當幽雅。校內有一座孔子廟，每年高雄市的祭孔典禮都在那裏舉行，我的幼稚園時代就是在孔廟裏上課的。民國四十二年我開始讀小學，到現在我仍記不起學校是不是有圖書館，縱使有的話，我想自己從未向學校借過書。

在小學生之間，漫畫書流傳很普遍，那是我最早的借書經驗。當時升學主義的風氣逐漸形成，除了白天上課之外，晚上還必須參加補習的課程，尤其上了五年級以後，那種單調枯燥的課堂滋味，與日俱增。回家後，不僅有家庭作業，同時也要背誦一些參考書籍，對於一位小學生來說，心理上的負擔是非常沉重的。自然而然，漫畫刊物就變成了課外的主要讀物，每當同學携來一兩冊新書，整個教室便爭相傳閱，原因無他，稚小的心靈也有沉悶的時候，漫畫可以帶來許多新奇的幻想，開拓思考上的原野。那時我最着迷的，莫過於牛哥畫的「牛伯伯打游擊」，書中人物滑稽有趣，造形方面的誇張，給人印象深刻，書中的游擊情節更使小孩子為之激賞，所以即使看過了，仍一再要求同學帶來學校。學校嚴禁小學生帶漫畫書到教

室，大人們稱它爲小人書，常常不定期檢查書包。查獲時，或體罰，或沒收，但依舊不能禁止我們秘密傳閱。像「東方少年」、「良友」、「學友」，都是陪伴我們度過寂寞童年的重要刊物。到現在我仍覺得，如果沒有這些漫畫書籍，恐怕童年時代黯淡了許多。我不瞭解當時的大人爲什麼會視漫畫如蛇蝎？小學時代的借書經驗，培養了我日後的讀書興趣，這也是爲什麼我特別懷念童年時一起看漫畫的那羣朋友。我正式向圖書館借書的經驗，則是進入初中以後的事了。從四十八年到五十四年我的初中高中生活都是在省立左營中學。這間中學原來是「高雄市立第一中學」，後來因教育廳實行「省辦高中，市辦初中」的政策，才由市立改爲省立的學校。從別人的眼光來看，這間學校並沒有特殊的地方，論升學率，不高；論校舍，也不宏偉，然而，在那裏却開始了我讀書的摸索時期。初中的第一、二年，可以說依然是小學時代的延續，我仍舊沉迷在漫畫刊物裏，常常拿錢到書攤借連環畫來看，想來我是成熟相當晚的孩子。那時看的漫畫，再不是「西遊記」或「原野奇俠」之類的內容，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奇奇怪怪的愛情連環漫畫，有喜劇，

有悲劇，看完後似懂非懂。到了初三那年，突然轉變了興趣，對小說有了莫名的好奇心。我清晰記得同學借我看的第一本小說，是畢珍著的「古樹下」，內容已經想不起來，大約是以抗日爲主題的小說，第一次看小說便手不釋卷，完全投入小說的情節裏。第二本借來的小說是王藍的「藍與黑」，記得這書的扉頁有一段引言，同學之間很熱心的傳述著，現在看來那段話也許平淡而無聊，却是促成我看此書的原因之一。總之，當時看小說主要是受同學的影響，而年齡的成長，似乎也漸漸知道要伸出自己的觸鬚，去探索，去尋找。

自從接觸了小說，才注意到學校的圖書館。左營中學的圖書館，是利用一間教室佈置而成的，侷促於校園的角落，和其他的教室一樣，室內非常陰暗。裏面的藏書恐怕沒有我現在的多，但是對一位初中學生來講，算得上龐大了。管理圖書的是一位瘦削的山東人，已近中年，對學生很和善。我們與他談話，比向他借書的次數還多。因爲，借書的手續很麻煩，借閱期限又相當短。由於沒有目錄可查，我們只能站在鐵窗外觀望，或者由同學告知有某本書，才能決定向他

借。每次借書，除了填表格外，還必須在學生證上面蓋章，然後他才從鐵窗的縫隙遞出來。往往在下課的十分鐘內，很難辦完借書的手續，中午休息時間又規定睡午覺，我們常常冒著違犯校規的危險跑去借書，所以在同學的感覺裏，借書實在是一種自找麻煩的事。後來，我便放棄在學校借書了。當時，我只覺得圖書館只是學校的行政部門之一，和學生沒有多大的關係，至少沒有像訓導處和學生那樣密切。

升入高中之後，我學會了看雜誌，才又回到圖書館走動。只有雜誌是開架式的，種類雖然不多，但是像「文星」、「人間世」、「幼獅文藝」等重要的刊物，都是在高中時代最初接觸的。不過，由於吸收知識的能力有限，在我個人的眼光裏，「文星」的水準很高，我只能零零散散地翻閱，所以當年的文化論戰，對我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，想來我又落後時代一步了。一個即將邁入青年階段的學生，他所閱讀的書籍，往往可以決定他日後應走什麼路線；很不幸的是，我那時候都沒有遇到一本使我着迷的書籍，如果有的話，大概就是租閱武俠小說了。

在高中的三年時光裏，我把許多寶貴的時間埋葬

在武俠小說堆中。我每天騎車子到學校，放學時，總會路過一家書攤，是專門出租言情和武俠小說的。最初是懷著好奇心去租閱，不久便上了癮一般，一部一部帶回家看。現在想起來，實在看不出武俠小說具有什麼價值，不過，那時並沒有考慮這些問題，這大概是年紀太輕的緣故，而環境的限制，也使我沉浸在這類無聊的小說裏。左營是一個偏僻的小鎮，沒有公立圖書館的設備，學校的藏書又不能吸引我，我只好到街上的書攤去搜求了。

當然，在租武俠小說之餘，我也借了些文藝書籍來看，假如要追溯我對文學發生興趣的原因，也許就在這個時候開始的。像於梨華的「夢回青河」，朱西寧的「狼」，都是在無意中遇到的，那時候並不是純粹看他們的小說，其他如瓊瑤的「窗外」，「六個夢」，甚至金杏枝、禹其民的言情巨著，我都一一讀過。事實上，對一個鄉下青年而言，於梨華和瓊瑤是並列的，我分辨不出她們究竟有什麼不同的地方，等到真正瞭解她們之間的差異，那已是大學時代的事了，至少在高中時，我對書籍的選擇一直都是盲目的，缺乏一位導師來指引，自然而然使自己的興趣局限在狹

窄的圈子裏。

高三那年，我遇到了一位英文老師，姜先生，（以後我才知道他寫了一部「辛棄疾評傳」），中英文的造詣都很高，學問也相當紮實。我之所以提起他，是因為他使我的讀書興趣開了新的境界，他是第一位拿柏楊雜文給我看的。從我看第一本柏楊的書——「聖人集」之後，我才發現除了小說之外，還有如此吸引人的書。我不知道別人對柏楊的評價如何，就我個人來說，讀他的文章能够體會到文字的力量，在輕鬆滑稽的語氣中暗藏嚴肅的精神，這都是我從前沒有讀過的。柏楊的書使我看到這個社會的真面目，也使我擴展讀書的視野。但是，那時已快接近大專聯考的日子，我沒有時間去搜集柏楊的書。全部讀完他的著作，則是在進入大學以後了。高中畢業後，便與姜先生失去聯絡，但到現在為止，我還是很感激他的。我感謝他的，不是讓我發現柏楊的書，而是讓我發現自己的興趣，讓我知道小說以外也有可讀的書籍。在我讀書的過程中，高三那年，可以說是我漸漸脫離盲目摸索階段的開始。

二、在史學與文學之間

五十四年我離開了左營，那年我十八歲，懷著恐懼而不成熟的心靈走向未知。和其他的年輕人一樣，我的志願是由聯招會決定的，我考進了輔大歷史系。在此之前，我總以為自己的個性是適合經商的；可是，讀了一年的歷史系之後，竟也覺得文史蘊藏著無窮的樂趣，從此我再也沒有後悔過讀歷史系，相反的，我為此倒頗有些自得。

輔仁大學是新設的教會學校，在師資和設備方面，自然沒有別的古老學校完整，可是在那裏的四年中，我可以感覺到輔大正努力地充實自己，企圖趕上其他的學校，這一點從圖書館的擴建便可看出來。輔大共有三座圖書館：一是屬於理學院的「自然科學圖書館」，一是法學院的「社會科學圖書館」，一是文學院的「人文學圖書館」。由於自己所學的是歷史，對於文學又具有探索的好奇，因此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利用文學院的圖書館。當時的「人文學圖書館」設在文學院大樓的三樓，面積相當狹小，大約僅可容納八十人至百人左右，每到考試期間，這座圖書館必定爆滿。

，人人如臨大敵，反而沒有讀書的氣氛。我欣賞的是，平時圖書館那種門可羅雀的情調，館內雖然只有兩三人造訪，但那種怡然自得的神態，使人體會到寧靜中的書香，在記憶裏，輔大圖書館確實是讓我懷念的一個地方。我歷史系所受的方法訓練，用最簡單的話說，便是憑事實講話，或者如胡適先生說的：「拿出證據來！」要找事實，要拿出證據，就必須多讀多看，這種訓練迫使我不能不常到圖書館找書。

在大學四年中，我從圖書館借到了不少可貴的書籍。我說的「可貴」，是指書籍給我的啓示和影響，因此在別人看來可能毫不足取，但對我個人却具有很大的意義。大致上說，我借閱書籍往往隨著興趣而轉移。在大二那年，聽到同學大談文化的問題，一夜之間，自己也突然對文化史熱心起來。第二天到圖書館，就盡量把有關文化史方面的書目抄錄出來，準備從此開始埋首研究。像梁漱溟的「中國文化要義」、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」，柳詒徵的三冊「中國文化」、陳登原的「中國文化史」上下冊，都在一股衝動之下借來的，不僅是一章一句地讀，而是還加眉批，完全是充滿了信心的姿態。其實，那不過是年輕人的一陣熱

血而已，充其量滿足內心的一點虛榮，對於自己的學問並沒有很大的幫助。因為讀文化史方面的書，接著對學術思想史也發生莫大的關心，錢穆的「國學概論」、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」，梁啟超的「清代學術概論」，馮友蘭的「中國哲學史」，胡適的「中國古代哲學史」等等，也都是在那個時候一一借閱。這種借書的方法，絲毫沒有條理，所以吸收知識也自然就沒有系統。唯一的好處，也許只能增加書目的知識罷了，日後真正要寫論文時，又必須重新翻閱一次，花費不少心力。類似的這種衝動到現在仍會不定期地發生，每次總要借閱不少書籍，而讀每本書也僅是點到為止；大部份這種因心血來潮而讀的書，都是通論性、概論性的，只能使我瞭解一些皮毛，難窺其堂奧，更說不上專注深入了。真正要做研究工作的話，必須要從第一手原始資料着手。不過，那時才二十歲出頭，血氣方剛，還不懂如何謹慎仔細做學問，只不過是因為借書比讀書的興趣還來得大些。

藉著對各種書籍的強烈好奇心，自然而然也使借書的範圍漸漸擴大，才慢慢知道有所謂禁書和絕版書。我們這一代的讀書人，大多對禁書懷有神秘、渴

望、畏懼等種種複雜的情緒，可能是由於時局變化的關係；到了我們這一個時代，禁書似乎特別多，這應該算是我們的一大不幸吧。我第一次借到顧頡剛的「漢代學術史」時，我的同學很驚奇，他們都說這是一本禁書。既是禁書，一定很難看到，我們對於不易得到的書總是喜悅而珍惜的，所以帶回家後，便專心地捧讀這本禁書。讀完之後，我實在看不出此書有任何被禁的理由，後來才聽說是因作者陷於匪區的緣故。等我進入研究所以後，發現顧頡剛的這本書已在臺北翻印，同時有兩家出版社在競賣，令我詫異不已。究竟是何時開禁的？不得而知。

自從知道圖書館藏有禁書，我便常常去翻閱館裏的目錄卡片，企圖找到更多稀罕的書籍。果然不久就發現譚丕模的「清代學術思想史綱」，費孝通的「皇權與紳權」，郭湛波的「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」等等，每次借到禁書，心裏總是很興奮，幾位熟悉的同學便輪流傳閱，金聖嘆說的那種「雪夜讀禁書」的境界，我們似乎可以領略一些。尤其是郭著的思想史一書，讓我們管窺到五四運動以來的思想流變，縱然只瞭解一些表面的史實，但已使我們這批狂熱的學生滿足

了，所以這本書不斷在同學之間流傳，直到學期末才回到圖書館。這本書以後也有翻印本，改名為「近代中國思想史」，而且是精裝的，正續編合訂，我們自然很感謝出版商功德無量，不過，讀禁書的那種情調、那種神秘的感覺，便煙消雲散了。

禁書讀多了以後，我們也逐漸讀到一些公開的禁書了，譬如書名被改，或是作者的名字被改，這方面的書我們也有很大的興趣，像陳寅恪的書被改為「陳寅著」，費孝通以「費通」的名字出現，陳登原則成了「程登元」，這是作者名字被改的例子；又如徐浩的「廿五史論綱」變成「廿五史述要」，劉大杰的「中國文學發展史」改成「中國文學發達史」，這是書名被改的例子，類似此種改頭換面的書籍，可謂不勝枚舉。有的更乾脆以「本館編輯部」的姿態出現，這才真正是公開的秘密。有一年，馮友蘭的「新事論」也在「本館編輯部」的安排下問世，不久便遭到攻擊，此書才又收入禁林之列。我到圖書館借閱此書，結果空手而歸，但因心有未甘，我便一再向同學詢問，終於在朋友的朋友處借到，才算了却一樁心願。

在那段時間，讀禁書不僅是要知道它的內容，而

且也是一種虛榮心的表現。同學中看禁書最多的人，都是值得我們欽羨的，不論他是否全部看完某本禁書，即使他僅僅摸過書的封面，我們也是相當佩服的，所以讀禁書已經成爲一種榮耀，書的內容或好或壞，只要是禁書就足夠吸引人了。這種畸形的心理不能不說是時代風氣造成的，如果書沒有被禁，或許不會引起我們的注意；既列入禁書，就變成了一樁秘密，在「窺私狂」的心理驅使之下，必須千方百計得手，才算罷休。像殷海光的「中國文化的展望」，在沒有宣佈爲禁書之前，我大概不會熱心讀這本書，一旦禁止閱讀時，大家便奔走相告，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形成一陣熱潮，一股渴望。又如李敖的「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」，也是在我大二那年變成禁書的，這本書的序言「新夷說」發表在文星雜誌時，我們就預感此書不可能流傳出去，果然在我買到之前，便被有關單位沒收了，但因聽說有許多人還是買到了，我們也四處去打聽借閱，一睹爲快。

整個大學四年中，除了讀正課之外，對禁書的搜求，不遺餘力。當然，環境的限制也是造成「禁書崇拜」的主因。在大三時，聽說圖書館藏有一套香港太

平書局翻印的「古史辨」，我迫不及待跑去借閱，圖書管理員規定我必須坐在館內看，不准攜帶出去，他們下班時又立刻收回去；所以，「古史辨」第一冊顧頡剛的那篇長序，我花了一星期左右的時間在圖書館裏看完，正因為限制重重，我更覺得非看完它不可。等我大學畢業後一年，臺北的書商又翻印了此書，到處都是「古史辨」，包括兩種版本，但這時我對此書的熱心反而淡下來了。我也覺得這種讀書的動機是不正常的，但我必須承認，這種反常的心理促使我讀了許多額外的書籍。

我在大學時代讀書一直游移不定，借書的範圍也跟著飄浮。直到大三下學期，我選過杜維運先生的「史學方法」一課以後，我才稍爲改變自己借書的方法，杜先生是一位謙虛的學者，他在中國史學方面的研究貢獻，頗受重視，他撰寫的「清乾嘉時代的史學與史學家」，與「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」兩部書，對我們有很多的啓示。得到杜先生的指導之後，我才固定了幾個借書的範圍，專門注意史學史的專書和論文，所以利用圖書館的機會就越來越多，同時，我也開始借閱一些筆記小說或古人的文集來看，像司馬光的

「涑水紀聞」、羅大經的「鶴林玉露」、張岱的「陶庵夢憶」、黃宗羲的「明夷待訪錄」，都是在那段時間借來看的。從杜先生那裏我學習到讀書要專，研究要從第一手資料着手，從那時起，借書才有了一定的目標。雖然如此，我有時候還是喜歡亂看書，到處亂借，這主要和自己的性情有關，因為那時候我也耽溺於文學的書籍裏。

我讀的雖然是歷史系，但因為在文學院的關係，耳濡目染，很容易接觸到文學方面的書，並且傳統的「文史一家」的觀念，即使到今天仍然沒有去掉，學習歷史兼治文學當是順理成章的事；而最重要的原因，是自己的興趣過於廣泛，對文學的關心並不低於歷史，因此圖書館裏的文學書籍也是我借閱的對象。輔大的現代文學藏書並不多，事實上，這也是臺灣一般圖書館的通病，或者更確切地說，臺灣的各大專院校對現代文學大多懷有偏見，甚至鄙視它，這種態度自然影響了圖書館的購書方針。在輔大時，許多同學對圖書館不買現代文藝作品的事，甚以為病；後來我到臺大，才發現那裏的圖書館也差不多，這個問題到現在我仍深深納罕著。不過，圖書館並非完全不買文

藝書，像比較重要的書局如：中華書局、正中書局、商務印書館等所出版的文藝作品，圖書館還是會購買的，可是這些書局出版的比例，與整個臺灣文藝界的產量相較之下，則微乎其微了。我常常懷疑，如果圖書館不購藏當代的作品，則後世的研究者將去何處搜求呢？我覺得圖書館沒有藏現代文學的書，就像一般中文系不開現代文學的課程一樣，都牽涉到一個「偏見」的問題。在中文系教授的眼光裏，必須是「古典」才算是書。什麼是「古典」呢？無疑的，凡是清朝以前的書，都可納入古典的範圍內，至多至多，也僅延伸到五四運動之前為止，再跨過一步便是洪水猛獸了，這樣的分期當然又精確又方便，但他們的偏見也跟著累積下來了。

「文星叢刊」是我們大學時最寵愛的書籍之一，幸好圖書館沒有遺漏掉這一叢刊。我認識現代文學的一些基本觀念，大多是透過文星叢刊得來的，當時很多的青年作家都以在文星書店出書為榮，他們努力介紹新鮮的觀念給當時的大學生，我們的談話內容也喜歡以他們的書為主題。那時候，我們幾位熟悉的朋友，常常比賽看這套叢刊，只要是圖書館的藏書，我們都

借出來看，相互討論，像余光中、周夢蝶的詩，於梨華、聶華苓的小說，何凡、錢歌川、葉珊的散文、梁實秋、黎烈文的文學批評，都收入了這套叢刊裏，他們提倡的文學觀念新穎而不偏激，誠懇且富於說服力，我們那一時代的年輕人幾乎很少沒有讀過他們的作品，至少那時候我們私下承認，文星叢刊確實是集合了當時聰明的頭腦與上乘的文筆，在提倡讀書風氣及出版事業方面，文星佔有重要的地位。猶記得我們那羣朋友，或站在圖書館外的長廊，或坐在文學院樓前的草坪，圍繞著相同的主题，品頭論足，也許說的都是一些隔靴搔癢、不着邊際的話，但我們覺得生活過得很健康，很充實。

大三那年，我在學校組辦了一個「水晶詩社」以後，對新詩的着迷更深一層，也因而開始注意搜求詩集。我到圖書館查閱，却發覺詩集的收藏稀少得可憐，當時非常驚奇。原來新詩的讀者不多，由於詩本身的晦澀難懂，更重要的一個理由，新詩與「古典」詩的差距太大了，既沒有「古典」的資格，自然就被排斥於圖書館的門外了。因此當時，借閱詩集，都是透過朋友的關係借來，常常一冊詩集到達手中時，已經過

了四、五個人的手，得之不易，彌覺珍貴。如果拿到的是一冊五十年代初期的絕版詩集，更是封底封面反覆摩挲，端詳許久，如紀弦的「摘星的少年」、余光中的「舟子的悲歌」，詩的內容也許比較樸素平淡，但體會到他們早期那種浪漫的精神，總是讓我低迴不已。新詩之可貴，在於詩人運用誠實的白話文，表達深遠的現代人的生活，在基本上與古典詩人是並行不悖的；奈何六十年代以後出現的新詩，竟走上悽厲曲折的歧路，白話文反成現代的「新文言」，前人的努力毀於一旦，能不令人浩嘆？在大學時代借閱詩集，頗受非議，詩人的錯誤，讀者也為他們分擔，想來實在是啼笑皆非的，這也是我日後從事新詩批評的主因，為的是要判別新詩龍蛇雜處的混亂局面，當然那種野心也不過是一項企圖罷了，我相信，風氣之迴轉端賴詩人的自覺。從大一看第一冊詩集開始，到現在恰好整整十年，這一段路程中，看盡詩壇的冷暖悲歡，但思量起來，畢竟喜悅還是多於痛苦的，每談起詩，便憶及大學時代的熱情與爽朗，更想起那些借詩集給我的朋友，有不少友誼是因為借閱詩集而建立起來的，像林煥彰、辛牧、施善繼、蕭蕭、景翔等朋友，都

因此而認識的，更可貴的是，我們這羣朋友日後又創辦了「龍族詩社」，人生的際遇是多麼奇妙，多麼不容解釋。

民國五十八年我離開輔大，那裏的人和事都值得我懷念，而在那裏所看過借過的書，更像一個個烙印深嵌在我的記憶中。在此特別一提的，我在輔大文學院圖書館借書時，常受到一位館員的幫忙，同學都稱呼她為「梁阿姨」，到現在仍舊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但我對她的感激則是無可言喻的。畢業那年，文學院圖書館擴建成一龐大的大樓，可惜我已沒有機會利用它，後來的學弟學妹確實比我們幸福多了。

三、書到用時方恨少

五十九年夏天服完兵役，我立刻又進入臺大歷史研究所，在這裏的借書經驗比以前又豐富了許多。臺大有三座比較大的圖書館，一是「總圖書館」，專供全校師生運用的，是最古老的一座建築物；一是「研究圖書館」，主要是為研究生而設立的，不過大學四年級的學生也可利用；一是「文學院聯合圖書館」，是由原來文學院各系的小圖書館組合而成的，善本書收

藏頗豐。看過這三座圖書館，才使我開了眼界，輔大的藏書自然無法望其項背。

凡是在臺大讀過書的同學，他們在總圖書館借書的經驗大多是不愉快的。總圖書館的藏書庫是終年不開放的，像一個巨大的謎，大家都不知道裏面藏有多少書，每次借書須先填好單子交給管理員，然後就要等待半小時，這三十分鐘可以坐在館內讀自己的書，時間一到必須趕快去領取，否則又會收回去。所以，人人總是擠在櫃台前，像等待開獎一般，如果借到書的話，當然驚喜萬狀；比較不幸的，一張借書單又會退回來，沒有任何答覆，我每次到總圖書館，很少是愉快的，以後就放棄利用它了。書庫之所以關閉的原因，我想是因為學生太多的緣故書庫容納不下；另一個原因，我相信是學生的道德心不高，偷書割書的事情屢有所聞，如果把書庫開放，無異引狼入室。我一直很遺憾總圖書館的書庫沒有開放，因臺大的前身是所謂的「臺北帝國大學」，數十年累積下來，藏書不可謂之不豐，果能進去一探寶穴，相信可以發現不少難得一見的好書。很多臺大同學都懷疑館內的目錄卡片不完整，就我們所知，臺大還有所謂的「特藏室」

，那裏面的書似不可能公開在目錄卡片上。謎終歸是謎，直到我離開臺大，我對這個圖書館始終保持著又恨又愛的矛盾心理。

比較起來，我是相當偏愛研究圖書館的，這是在我進臺大的前一年建成的，裏面所有的書籍全面對學生開放，這裏的藏書雖然沒有總圖書館完備，大致上，文學院學生所需要的原手資料及期刊雜誌還算整齊。我在臺大三年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都在那裏度過，有時找不到書，固然有點悵悵，但大部份的書還是足夠用的。這座圖書館分成兩部份，一是閱覽室，一是藏書室。閱覽室放置的書籍以大部頭的叢書為主，如：四庫全書珍本、四部叢刊、四部備要、國學基本叢書、叢書集成簡編，各種版本的廿四史，書目、引得等工具書，換言之，比較普遍的重要書籍在閱覽室就可看到。藏書室則收藏比較專門的書籍和期刊，共分五樓，一樓是一般性的分類書，大多是近人的著作，有一半則是尚未整理的日文藏書（現在或已整理完畢）；二樓則是叢書，如正誼堂全書、聚珍版叢書，學海類編、小萬卷樓叢書、守山閣叢書、知不足齋叢書、學津討原、史學叢書等等，適合文史系的研究

生；三樓是日文藏書，大多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；四樓是中文期刊雜誌，大部份重要的論文都可在這裏找到，五樓是中文報紙的收藏，自三十八年以來的各家報紙，收輯非常完整。各樓藏書的次序，記憶或有錯誤，大致如此。二樓和四樓的藏書是我比較喜歡的，因抄錄卡片大多需要這裏的書。進去藏書室並非都是為了研究，有時也是為了興趣，尤其是早期的雜誌，常使我有意外的收穫。像「自由中國」、「文學雜誌」、「民主評論」、「文史雜誌」、「中研院史語所集刊」、「大陸雜誌」等等，都是我所偏愛的。不過，藏書室的一個缺點是，自己的書不能帶進去，裏面的書不能帶出來，有時要相互對照時，必須來回奔波，很不方便，但這種情形很少發生。因為裏面的書帶不出來，有些研究生曾經用刀片割下書中他所需要的部份，使其他同學怨聲載道。讀者道德心不高，始終是臺灣一般圖書館設備的一大致命傷，因為有偷書的事件，圖書館就必須防範，防範愈密，借書愈難，偷書就愈多，而造成了惡性循環。

研究所三年級時，我因撰寫關於宋代史學的畢業論文，借用了歷史系的「第三研究室」，即「宋遼金

元史研究室」，這間研究室是姚從吾先生生前做學問的房間，他就在這研究室過世的，裏面藏了大量遼金元史的史料，他去世後，便由他的學生陶晉生先生負責管理，陶先生是我的指導教授，允許我使用這間研究室。他交給我研究室的鑰匙時，我心裏既興奮又感激，我的論文之所以順利完成，陶先生的指導固是主因，不過，他讓我利用研究室，更使我可以專心進行。有好幾次我都讀到深夜才回家，文學院鬧鬼是有名的，據說傅樂成先生還親眼看過（是幻覺或吹牛，姑妄聽之），我心裏有鬼，卻從未碰過。現在想起來，那段時間是寧靜而愉快的，主要是我需要的書籍，在那裏都可讀到。翻閱書籍時，常可發現姚從吾先生加上去的眉批、註解，幾乎每本書他都碰過，足見他生前之有功。在那裏也看到姚先生的一冊剪貼本，把有關胡適先生的新聞，包括生前事蹟和去世消息，都輯成一本書，這點也反映了他對胡適先生的尊敬與懷念。

撰寫畢業論文的期間，更覺得自己從前吸收的學問太粗疎了，往往爲了解決一個問題，或者尋找一件史實，需要參閱數種史料，同時也需注意近人的研究成果，爲此我不僅往返於文學院與圖書館之間，而且

也常常跑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的「傅斯年紀念圖書館」找資料。傅斯年圖書館的閱覽室放置了大量的期刊，都是淪陷前在大陸出版的重要學術雜誌，如「東方雜誌」、「清華學報」、「燕京學報」、「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」、「漢學」、「學衡」等等，後來這些學報已大部份在臺北一一影印。但是在我那個時候，却必須坐公共汽車，花四五十分鐘的時間跑到南港參閱，這個圖書館不方便的地方是，在中午時間，管理員把所有的訪客讀者請出去，凡是在此讀書，中途都必須攔下來，等待下午繼續開放。另一個不方便，是借閱陷匪的學人著作，必須由學校開出一張公函，經由史語所所長的批准才能借出，我不明白要加上這層限制的理由何在？如果那些書籍真的是洪水猛獸，則大可不必編入目錄卡上，更不必購買此類書籍，同樣是由人民納稅購買的書，爲什麼學者可以閱讀，學生就不可以呢？「把持資料，謂之權威」，這是中研院一向爲人詬病的，那也是我親自領教過的借書經驗。這種封建的官僚氣習，並不是中研院圖書館才有，臺大的「特藏室」似乎也具備了同樣的特徵。借書不方便是我們學術界進步緩慢的主因，我常常著想著

，有一天臺灣所有的圖書館都能全面開放，人人各取所需，順利進行各自的研究，我們也就不必擔心漢學研究中心跑到日本、歐美去了。前些日子，還有人在雜誌上討論臺灣能否成為世界漢學中心的必備條件，我認為討論我們藏有多少書籍多少資料，都是無益的，只要圖書館絕對公開，漢學中心自然就會搬到臺北來。

在研究歷史的同時，我也在新詩批評的領域開始探索，最初我很有野心要建立臺灣新詩史，等到我真正搜集資料時，竟發覺詩集的散佚情形已非常嚴重。自三十八年以來，只有廿餘年的光陰，臺灣的生活環境尚稱安定，書籍保存應該相當完整，但實際上並不如此，我所能看到的詩集大致都在十年內出版的，十年之前的則很難求得，至於二十年前的，幾可視為珍本了。企圖在一般圖書館借到詩集，等於是緣木求魚，在我出國前的兩年中，花了不少時間尋找詩集，大多是去拜訪私人的藏書。記得余光中先生送給我二十年前出版的「藍色的羽毛」時，他特地在扉頁題上「海內孤本贈芳明」，視為「孤本」固然有些誇張，但這不也說明這個時代的詩集之難存嗎？如果要在公立

圖書館找到一套「紀弦全集」或「余光中全集」，恐怕是一個奢望吧。「徐志摩全集」的誕生，還是在徐志摩逝世三十餘年之後，經過有心人的多方搜求，才編輯而成，則臺灣的詩人大概要等上一段時間，變成「古典」之後，才有資格進入圖書館吧。去年，有人整理臺灣新詩集的書目，很少利用過公立的圖書館，完全是依賴私人藏書編集的，因此，不可能蒐羅得完整。今年又聽說林煥彰先生正編輯新詩的書目，相信他也不可能在圖書館搜集到完整的資料吧。

我個人在搜集新詩史料方面，可以說全力以赴，我對公立的圖書館已經絕望了，大部份都是從私人藏書借到的。例如以前在「公論報」發表的「藍星週刊」，共發行兩百餘期，我想不會有人熱心剪貼下來的，經過多方打聽之後，結果在周夢蝶先生處借到「藍星週刊」的前半部，又在羅行先生處借到後半部。我第一次把前後兩部放在一起時，心裏不禁感嘆，看著已經變黃脫落的紙張，及脆弱不堪的裝訂釘痕，深深體會到臺灣從事新詩的工作者實在是寂寞的。無可否認的，臺灣的新詩仍舊在成長的階段，距離成熟的標準可能還要經過長時間的考驗，但是什麼才算是成熟

呢？是不是要經過學者的研究，變成一部學術著作之後，才承認它是成熟的呢？姜貴的小說如果沒有經過胡適的推薦，今天的圖書館恐怕不可能藏有他的書吧。說不定也會有更諷刺的事發生，某圖書館可能藏有一部水晶的「張愛玲的小說藝術」，但館內却沒有一冊張愛玲本人的作品，因前者是學術著作，後者則够不上「古典」。事實上，一個健康的圖書館應是各類書籍兼容並蓄的，不能因為一種文學形式還未成熟，就完全不予重視，這種「以成敗論英雄」的藏書標準，未免太趨於功利了吧。一種書籍的出現，正反映一個時代的現象，而圖書館則是一個時代的檔案室，以此來看，詩集所具的意義，則不容抹殺。

我因注意臺灣的新詩史，覺得要建立這段史實，勢必要追溯到三十年代的詩壇，甚至要推到五四時期的發展背景，因此我也有心要搜集淪陷前在大陸出版的詩集。對我們這個時代的青年來說，「三十年代文學」不過是一個歷史名詞罷了，我們從未親眼看到當時的作品，最多只是從長一輩的口中，或是從別人的文學批評裏，略知概況之一二。我們確實很渴望讀到，那種長期亢奮的渴望逐漸發展成一種「崇拜」，有

些朋友都以偷看了此類的禁書而沾沾自喜，無疑的，那種崇拜實近乎盲目。在臺灣，對三十年代新詩的介紹，當以痲弦主編的「新詩史料拾掇」較具規模，但因環境的種種限制，他不可能做得很完整徹底。我第一次讀到三十年代詩人的詩集，是臺灣翻印何其芳的「預言、秋天、狂風沙」，這本書不久就被禁了，我之所以能看到，也是從朋友處借到的，大家互相傳抄。後來陸續讀到臧克家的「烙印」、「運河」，李廣田、卞之琳、何其芳合著的「漢園集」，都是在我離開臺灣前所能讀到的。記得胡耀恆、朱西寧兩位先生分別在「中外文學」和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」為文，建議開放三十年代的文學，我覺得他們的建議是誠懇而得體的，且不討論開放的積極意義，從消極方面來看，三十年代文學開放以後，可以完全消弭青年盲目崇拜的變態心理，因為當時的文學並非都是美好的，時下的青年隨便偷看到一本就稱讀一本，結果他們的看法與官方出版的卅年代文藝批判之類的書籍，背道而馳，與其朦朧他們，不如讓他們睜開眼睛來辨認，愈壓抑他們，除了增加他們的狂熱之外，收不到任何的效果。

四、飄泊的書籍

六十二年我從台大畢業，回到母校輔大執教一年，雖然回去的身份不同，但許多舊夢似乎又重溫了一次，我曾到文學院圖書館去借閱從前看過的那些「禁書」，結果有不少書已被偷走了，像譚丕模的「清代學術思想史綱」，已不見踪影，當時不禁怔然，總覺得有一部份舊夢被偷走似的。風氣如此，亦無可奈何。

第二年夏天，我因申請了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歷史系，便懷著憂傷的心情離開了臺灣。華大建校於一八六一年，距今已一個世紀而有餘，比起美國東部的大學，華大是年輕了許多，不過在藏書方面並不落後。來此後，我對圖書館的觀念才漸漸改變過來。華大有兩座大圖書館，一是蘇薩洛圖書館（Suzzallo Library），主要是研究生利用的，一般大學部的學生也可利用，不過借書的期限較短；另一個是大學部圖書館（Undergraduate Library），開放給全校師生，但主要對象還是大學生。蘇薩洛圖書館的藏書最豐，全部是開架式的，書庫就等於是閱覽室，

讀書環境相當良好，書香四溢，令人駐足。研究生借書以一個學期為限，但可以請求延長，除非有人登記要看（place a hold），否則此書，能够長期由個人保管，借書的數量沒有限制，可能的話，儘可請一輛卡車來載書，大學部圖書館的藏書，借期甚短，以兩個星期為限，必要時也可延長，有一部份書是學生課堂上的指定教科書，謂之reserve book，借期是四小時到三天不等。華大除了這兩大圖書館，還包括十六個小圖書館，或設在醫學院，或設在理學院，或分設於各系，行政上直屬於總圖書館，我利用次數最多的便是「遠東圖書館」（Far Eastern Library）。

我第一次到遠東圖書館時，沒有料想到它有那麼多的東方藏書，二十萬冊的圖書中，有十三餘萬冊是中文書籍，據說在美國各大學所藏的遠東圖書中，還是居第十位的，則美國的中文書籍之豐富亦可思過半矣。此圖書館的正、副館長都是中國人，盧國邦先生與譚煥廷先生，對學生相當熱心，絲毫沒有官僚架子，雖然館中還有十餘位的館員與雇員，他們仍不時親自為學生服務，與臺灣的圖書館比較起來，實有天

淵之別。我覺得臺灣的圖書館應稱為「藏書館」，因為大多數的圖書館只是爲了收藏書籍，並沒有考慮到讓讀者學生如何運用，館員只注意有沒有保持原來書籍的數量，忽視了爲讀者服務的次數。這裏正好相反，他們考慮的是讓學生在最方便的情況下利用圖書，考慮一本新到的書籍如何能以最快的方法到達學生手中，學生愈覺得書容易借到，偷竊之心則愈減少，因爲他們隨時可以看到書籍，不必偷竊就可長期讓個人使用，無形中，也提高了學生的道德心，圖書館雖全面開放，而且很少檢查學生的書袋，但圖書遺失率却非常低。

圖書館裏的書籍採購組主任，是一位來自臺灣的留學生，吳燕美女士，她是臺灣大甲人，曾在加州大學負責管理東方圖書館；來此則已有五年，她專門負責向臺灣、香港、日本訂購書籍，我來華大以後，受她的幫助最多。據她說，每年購買中文書籍的經費，平均約在美金二萬元左右，書籍五分之三強由臺灣書商供給，香港書商則供給香港、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出版的書刊，少數中文書籍及研究中國的日文專書購自日本。遠東圖書館與華大其他圖書館一樣，接受教授

和研究生的建議，隨時可以訂購自己所需的圖書。我需要的每本書，如果在館內找不到，就立刻向她提議購買，大約在一個半月左右就可到達手中，用書之方便如此。在臺灣的圖書館中，似乎只有臺大研究生圖書館接受讀者的建議，不過買書的速度沒有那麼快，此或許受經費的限制，但接受讀者建議訂購的態度，則是值得稱讚的。

如果遇到絕版書，不可能自國外訂購時，還有一種「館際借書制度」(Interlibrary Loan)可以補救。我因注意收集中國史學史方面的專書，對館內這方面的書目比較關心，有些書已經絕版，吳燕美女士認爲我可以從別的圖書館借閱，手續非常簡單，只要填兩張卡片，把書名寫上，大約三、四週內就可以借到，像王玉璋的「中國史學史概論」，借自史丹福大學的胡佛圖書館；金井之忠的「唐代之史學思想」，借自芝加哥大學的遠東圖書館，借閱期限從兩週到一個月。不僅書籍如此，自己需要的論文也可從別的大學影印過來，手續和借閱書籍相同。

由於館際借書制度非常健全，所以無論在美國任何一個地方，都可利用到全國的書籍，聽起來近乎神

話，如果沒有親自經驗到，簡直認為不可思議，透過這個制度，我已借了無數的圖書，像三十年代的新詩大多是借自別的圖書館，如戴望舒的「我底記憶」、
「望舒詩稿」、「災難的歲月」、「望舒草」；朱湘的「草莽集」、「海外寄覽君」；臧克家、艾青、田間的詩集等等，他們的全部作品都一一過目。遠東圖書館有意搜集五四以來的新詩集，他們不僅編書目，而且也拚命到處求購，他們的野心是，有一天學者要研究中國的新詩，勢必要集中到這個圖書館來。他們認為，只要是一本書，不論它的好壞，他們都當作一本書來處理。只要一本書讓讀者看了，那麼這本書就發揮它的作用了，這種觀念確實值得我們學習。當然，在這種觀念的背後，必須有龐大的經費來支持，在這方面臺灣的圖書館限制很大，但這樣的觀念不妨做我們的借鏡。

大致說來，我到華大以後，在用書方面從未發生過困擾，當初到達這裏時，我很擔心會和臺灣的讀書界隔絕起來，特別是新書的出版，總以為要等一兩年以後才能看到。沒想到他們訂購新書相當迅速，凡是重要的新書，兩三個月內便到達此地，即使我身在臺

灣，讀新書似乎不可能那麼快，一方面是自己無力購買，一方面是圖書館處理新書的效率不高，相形之下，我和臺灣出版界反而比以前密切多了。這裏的圖書館員也瞭解，他們不可能完整地購買臺灣全部出版的書籍，在這方面他們很謙虛，常常向臺灣來的留學生請教，如果有值得購買而遺漏，可以隨時向他們建議，做為以後購買方針的參考。就我所知，此館定期購買的叢書有：人人文庫、三民文庫、新潮叢書、書評叢書、萬卷文庫、遠景叢書、純文學叢書、文史叢書，幾乎是每出版一本就購藏一本，至於重要的書局如商務印書館、中華書局、世界書局、正中書局，學生書局、文海出版社，廣文書局等國學叢書，及學人的著作專書，都是他們訂購的對象。他們大多是主動去尋找新書，而不是被動等待書商寄書目來。

每次看到臺灣有新書寄來，心裏固然興奮，但也多少覺得哀傷。這些飄泊的書籍，和留學生的心境一般，都是寂寞的，有許多書在這裏封塵許久，往往借到一本書，有一、二十年都沒有人碰過；這樣的圖書館利用起來，頗像私人的藏書，但每提及它們迢迢千里渡海過來，就只爲了被冷漠地放在書架上，不能不

使人喟嘆，如果讓這座圖書館搬到臺灣去，全面公開給臺灣的學生，借書的制度完全和這裏一樣方便，真不知要受惠多少學生。真正需要讀書的人，不容易看到自己需要的書，而真正能購買起書的人，却用不完那麼多書，上帝不免太惡作劇了。

從小學讀書以來，便日夜夢想可以碰到一座隨心所欲的圖書館，這樣的夢做了二十年，實現的時候却在距離故鄉千里以外的異邦。不過，我還是懷念在臺灣的種種借書經驗，特別是大學時代，爲了尋求一本書，費了不少苦心，一旦得手時，那種興奮之情無以復加，而偷看禁書的那種氣氛，如今只能在記憶中揣摩。我相信，我們那時代有我們自己的情趣，今天的大學生也許在重演我們的鏡頭也未可知，我的心情是矛盾的，希望那種情調一代一代延續下去，但更希望，有一天我的下一代讀書不必那麼辛苦，他們可以得到一座，不僅僅是一座，完全開架式的圖書館。（一九七五、十、十九、西雅圖）

【附記】：有關華大遠東圖書館的資料，是吳燕

美女士供給的，特誌謝意，更感謝她給我的許多幫助。

李卓吾著：

初潭集

出版了！

明朝大宗師卓吾先生，奇言瑰行，見識獨特過人，嬉笑怒罵皆文章。本書仿世說新語、類林體例，而搜羅之廣，內容之富，文采之精妙皆遠邁前書。全書充滿奇人妙事、智慧言行，是文史哲研究者的珍典。25開本，五〇〇餘頁穿線裝訂、重新標點鉛排，印書紙精印。只印製五〇〇本，請把握機會每部售價一二〇元。

維摩精舍叢書

本書由當代禪宗大師袁煥仙主講，其及門弟子南懷瑾教授等多人編纂。東西精華協會「禪學師資進修班」採用爲教材。爲研究禪宗、啓發靈智之珍典，字字珠璣，充滿智慧。仿宋木刻本景印，字大清晰，售價平裝本（兩冊）二〇〇元，線裝本（六冊）二五〇元，存書不多，售完奉還書款。

■ 郵撥帳戶：一〇〇四八三號周彩霞，當即奉寄